

· 許必部幹 ·

命 革 興 家 國

著 寧 列



社 放 解

· 讀 必 部 尊 ·

命 草 興 家 國

說學的家國於關義主思克馬
務任的中命革在級階產無與

著 寧 列



社 放 際

夜 日 本 哲

出版者的話

本書本版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所出中文新版本翻印的，而後者是按照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本書原文最新版本譯出的。但本書仍保留了舊版的七條註釋，即本書本版註釋第四、七、八、九、十八、十九、二十三諸條。

解放社編譯部

一九四九、十一、七。

571.1
347-3=5

目次

初版序言	七
再版序言	九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二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二
二 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四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六
四 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九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三
一 革命底前夜	三
二 革命底總結	六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三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三
一 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三
二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四
三 國會制底消滅	四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四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三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三
一 『住宅問題』	三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三
三 給伯伯爾的信	三
四 『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	六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六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七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七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七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七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六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六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六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六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六
三 考茨基與潘桑枯克的論戰	六
初版書後	一〇
簡要註釋	一一

初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時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加劇並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地密合起來，它所加在勞動羣衆身上的駭人聽聞的壓迫，就愈益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我們在這裏是指它們的「後方」而言——已變成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役牢獄。

遷延不止的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慘象與災難，使羣衆底生活狀況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義憤加強起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它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已獲得實際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積累起來的機會主義成份，造成了在全世界上各正式社會主義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科夫斯卡婭、路班諾維契以及稍帶掩飾色彩的策列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及其同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達維德等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爾、黑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漢德曼和費邊派（一）等等）口頭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不僅對於「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表示奴僕式的卑鄙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偉大列強是早已在剝削着和奴役着很多的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恰恰就是爲了分割和重分這種贖物的戰爭。若不與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則使勞動羣衆從一般資產階級影響下，特別是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便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且來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而對於這個學說被遺忘了的或遭受了機會主義曲解的諸方面，加以特別詳細的論述。其次，我們將特別分析從事於這種曲解的主要代表，即在這次戰爭時期中陷於極端可恥破產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首領考茨基。最後，我們給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作一主要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大抵正在完結其發展底第一個階段，可是一般講來，整個這次革命，祇能認為是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就不僅獲得了實際政治意義，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義，因為這個問題是關於要向羣衆說明，爲着使自己從資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應當在最近將來做些什麼事情的問題。

作者。一九一七年八月。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時幾乎沒有改變。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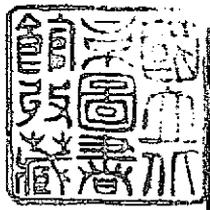
作者。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現今的遭遇，正如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底學說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遭遇一樣。當偉大革命家在生時，壓迫階級總是用不斷的追求來酬答他們，總是以最野蠻的惡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中傷來對待其學說。當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說是把他們偶像化，給他們的名字賦予某種榮譽，以便「安慰」並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闢劃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其革命鋒芒，而使之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這樣「修琢」馬克思主義的事情上正趨於一致了。他們把這學說底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遺忘，而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覺得可以接受的東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頌揚。現在，所有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要藐視他們呀！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這些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甚至日益頻繁地說着什麼「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彷彿這個馬克思造就了極有組織的工人協會乃是爲了進行劫掠戰爭哩！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學說。爲了這點，我們就須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著作中拿出許多很長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證，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且難於通俗；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



論及國家問題的一切句段，或至少是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句段，必須儘可能完備地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够獨立地領會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全部見解，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又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真憑實據地證明出來和一目了然地指明出來。

我們現在先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講起，這書於一八九四年已在斯多德牙爾印行第六版了。我們必須從德文原本中譯出引句，因為該書俄文譯本雖多，但其中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是譯得極不好。

「國家——恩格斯在總結他那歷史的分析時說道，——絕不是從外面強迫加給社會的一個力量。國家也並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現實」或「理性底外形和現實」。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方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爲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彼此經濟利益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互相消滅而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駕於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當中產生出來，但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思想，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恰巧就開始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而按兩個主要方面進行着。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雖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僅僅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却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調和階級底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則國家就會既不能發生，也不能支持下去。而按市儈的和庸俗的

大學教授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哩！——看來，國家却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既把這種壓迫法定和鞏固起來，同時又緩和階級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彷彿緩和衝突乃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鬥爭手段。

比方所有一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當關於國家底意義和作用的問題恰巧成了非常嚴重，成了在實踐上立刻行動，而且是廣大規模行動的問題時，他們都一下完全落到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所有這兩個黨底無數決議及其政治家們底許多論文，都完全被這個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所浸透。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決不能和它的對立方（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這一點却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也再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就這樣說），而是唱着貌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更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又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述一點：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駕於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並且非消滅統治階級之所建立，而在其中體現了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如我們在上面所可看見的，就是馬克思根據對革命任務之具體歷史分析而絕對肯定地作出的結論。而正是這個結論竟被考茨基——這點我們在下文中要來詳盡指明——……所「遺忘了」和曲解了。

二 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國家與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第一個特徵——恩格斯繼續說，——就是它按地域標準來區分其管治下的人民』：這樣的區分法，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與按宗族或氏族為標準的舊組織作過長期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特徵，就是社會權力底建立，這個權力已經和那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個特別的社會權力之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後，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這個社會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構成這個權力的，不僅有武裝隊伍，而且還有實體的附屬物，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機關，這些東西是氏族社會制度中所沒有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那稱之為國家的『力量』，即由社會中產生出來，而使自己駕於社會之上且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底主要點何在呢？就在於那些支配有監獄等等的特別武裝隊伍。

我們完全有權說這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權力是與武裝居民，與其『自動的武裝組織』，『不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如同所有一切偉大革命思想家一樣，他盡力使覺悟工人注意的，正是那種被普遍流行的庸俗觀念認作是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以為常的，而為那些不僅牢固並且可說是頑梗不化的偏見所牽若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底主要工具，但是——難道可以不這樣麼？

在十九世紀末葉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而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經歷過，沒有眼見過一次大革命，——這是不能不這樣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何以

需要駕於社會之上而使自己與社會脫離的特別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等）這個問題，西歐的和俄國的庸人一味從斯賓塞（一）或米海洛夫斯基（二）那裏借用三言兩語，藉口說什麼社會生活複雜化，什麼職能分化等等，來作答覆。

這樣的藉口似乎是「合乎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和蒙蔽主要的本事實，即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個分裂，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與那些使用棍棒的猿猴羣，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宗族社會的人們底原始組織比較起來，祇是程度上複雜得多，技術上高越得多，但這樣的組織總會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彼此敵對，且敵對得不可調和的階級，而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那它們便會彼此武裝鬥爭起來。於是就有國家形成起來，就有特別的力量，特別的武裝隊伍成立起來，而每次革命在破壞國家機關時，都明白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力圖恢復那替它服務的特別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如何力圖創造這類的新組織，即能於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組織。

恩格斯在上述議論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是每次大革命都在實際方面明顯地而且以廣大行動規模提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別」武裝隊伍與「居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互相關係問題。我們往下就會看見這個問題怎樣由歐洲歷次革命和俄國幾次革命底經驗所具體表現出來。

但我們且回頭來看看恩格斯底敘述吧。

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個社會權力是薄弱的（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北美在帝國主義前期自由移民佔多數的那些地方），但一般說來，這個權力是在加強着：「社會權力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化以及鄰近國家增大與人口增多的程度而加強起來。例如

拿現今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把社會權力激增到勢將吞食全社會甚至全國家這樣的高度。」：

這一段文字至遲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標明爲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底完全統治來說，無論就最大銀行底專權現象來說，無論就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來說——在法蘭西還剛才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兩國，甚至還更薄弱些。從那時起，「侵略競爭」已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因爲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國家所瓜分完結了。從此海陸軍備已無限增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由於英德兩國互爭世界統治權，由於瓜分贖物而進行的強盜戰爭，使社會一切力量都被強盜國家政權「吞食」到已接近於完全崩潰的地步。

恩格斯還在二八九一年就已能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大強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而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當正是這個競爭已經加劇許多倍並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却用「保護祖國」，「保衛共和國與革命」等等的辭藻，來遮掩他們保護「自家」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的行爲！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維持駕於社會之上的特別的社會權力，就需要賦稅和國債。

：「官吏既掌握着社會權力和徵稅權，——恩格斯說，——他們就成爲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氏族社會各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對官吏們說來已經是不够的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於是製定出一些關於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區區

不足道的小警察」都擁有大過於氏族代表的「權威」，可是甚至文明國底軍權首領，一見氏族酋長享有的那種「不是用威迫手段獲得的社會敬意」時，都得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提出了官吏之爲國家政權機關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能够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一八七一年如何由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過，而在一九一二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煞過。

：「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就是那個最強大的階級，在經濟上佔統治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就成爲在政治上也佔統治的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並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不過也常遇到一些例外的時期，那時彼此鬥爭的階級達到這樣勢均力敵的狀態，使國家政權暫時得到對於這兩個階級的相當獨立性，成爲彷彿是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獨裁君主制，法國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德國底俾斯麥時代，就是如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在已轉而壓迫革命無產階級以後，當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已經軟弱無力，而資產階級又還沒有充分力量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就是如此。

在民主共和國內，——恩格斯繼續說，——「財富運用自己的權力，是間接的，但因此是更可靠的」，——第一，就是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美國）；第二，就是用「政府與交易所聯盟」的方法（法國與美國）。

現今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甚至在任何設民主的共和國內，都已把這兩種維護並實施財富專權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舉例來說，既然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頭幾個月，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帕里琴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四）中對於

一切制裁資本家和制止其掠奪行爲，制止其藉供給軍需品來盜竊國庫的種種辦法，都實行怠工，既然帕里琴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帕里琴斯基同樣的人來代替了他），就被資本家「獎賞了」年薪十二萬盧布的位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是直接的收買呢，還是不直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加聯盟呢，還「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切爾諾夫輩與策列鐵里輩、亞甫克森鐵夫輩與斯科別列夫輩究竟起着什麼作用？他們是那些剽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還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財富」專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其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爲它不依賴資本主義之不良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經過帕里琴斯基輩、切爾諾夫輩、策列鐵里輩等等）這個最好的外殼之後，就能如此可靠地，如此牢固地來確立自己的權力，致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無論何種人員、機關或政黨之更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權力。

還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爲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顯然是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長期經驗，所以他說道，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的標誌。在現今國家中，普選制是不能而且始終不會給出更多東西的。」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像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一樣，都正是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懷着一種妄想，並且要人民相信這種妄想，以爲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裏」真正能夠表現大多數勞動者底意志並保障這一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個妄想；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聲明，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宣傳和鼓動中，是隨時隨地都遭到曲解。至於恩格斯在這裏所駁斥的這個妄想底全部虛偽性，則我們以後在繼續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今」國家的見解時，還會加以詳細揭破的。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總結如下：

「由此可知，國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過不必需要國家，而且根本就不知「國家」和「國家

政權」爲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爲各階級時，國家就因這種分裂而成爲必要的了。在我們現時正迅速走近之生產發展底更高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復必要，而且還成爲對於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將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出來一樣。階級一經消逝，則國家也會不可避免地歸於消逝。以生產者自由平等聯合爲基礎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會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是它所應份到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而與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派底宣傳鼓動作品中，很少遇見。而且就即今遇見有這段引文時，也多半是彷彿崇拜偶像才把它引用來的，就是說，是爲了向恩格斯正式表示敬意，而絲毫也不企圖思考一下，所謂「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裏去」，這意思是說，該預先要有何等廣闊而深刻的革命。他們甚至往往不懂得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 國家「消亡」和強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一語，負有這樣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頻繁，又這樣明顯地指明機會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把戲底本質所在，遂使我們必須對此作一番詳細考察。現在我們且把從中引出這語句的那段言論全部轉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但這樣一來，它就消滅它自己之爲無產階級，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一切階級區別和階級對立，而同時也消滅國家之爲國家。在階級對立中進展而至今存在着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即必需有當時剝削階級底這個機關，以便維持其生產底外部條件，就是說，特別是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拊制在當時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奴隸

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之內。國家會是整個社會底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祇是因爲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底國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國家公民資格的奴隸主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當國家終究真正成爲全社會底代表時，它就會自行成爲贅物了。當任何一個必須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已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單獨生存競爭已不復存在，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過火情事也一併消失時，那時就會沒有什麼必須加以鎮壓了，而用以實行鎮壓的特別力量，即國家，也就會再不需要了。國家將來以全社會員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贅舉而自行湮沒下去。那時，對於人的管理便會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滅的。我們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關於「自由人民國家」的語句：這個語句在鼓動的意義上是可以暫時存在，但歸根到底說來，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我也應當以此爲根據來估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關於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的要求。」(『杜林先生推翻科學的舉動』。『反杜林』，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可以大膽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議論中，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成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認爲國家「消亡」而與無政府主義「廢除」國家的學說不同的這一點。這樣來截斷馬克思主義，就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在這樣的「解釋」之下，就僅僅留下一種模糊的觀念，以爲只有慢慢的、平坦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風暴，沒有革命。對於國家「消亡」之流傳的、普遍風行的、大眾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瞭解，無疑是蒙蔽革命，甚至可以說是否認革命。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最粗暴的、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曲解，這種曲解在理論上

是由於把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來的恩格斯「總結」議論中也指出了的最重要情節和理由都遺忘了。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既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就消滅國家之爲國家」。至於這是什麼意思，那却是「照例」用不着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點，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在這幾句話當中，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底經驗，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簡明地表示出來了，關於這點，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來更詳細地論述。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

第二，國家是「特別的鎮壓力量」，恩格斯這個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這裏已說得十分明顯了。而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少數豪富對千百萬勞動者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所施行的「特別鎮壓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消滅國家之爲國家」，也就在於此。以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不言而喻的，這樣以另一個（無產階級的）「特別力量」來代替這一個（資產階級的）「特別力量」的更換，絕對不能按「自行消亡」形式來實現。

第三，恩格斯說到「消亡」一語和甚至說得更鮮明更光彩些的「泯沒」一語時，他完全明白而肯定地說是指「國家以全社會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以後，即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代而言。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恥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也就是關於民主制底「泯沒」和「消亡」。驟然看來，這似乎是很奇怪。但是祇有那些對於民主制也是國家，因之當國家消逝時民主制也就消逝這點不會思索到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瞭解」。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祇有革命才能够把它「消滅」。而作爲最完滿民主制的國家，是只能

「自行消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他說「國家自行消亡」的這個著名原理後，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他從「國家消亡」這個原理中所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可以担保地說，在讀過或聽過關於國家「消亡」言論的每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不僅是把他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用去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已。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大概有九個人不懂得何謂「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爲什麼攻擊這個口號就是攻擊機會主義者，歷史就是這樣寫法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被人暗中假造爲普遍流行的庸人主義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重述了千百次，被人庸俗化了，被人最簡單化地打進頭腦中去，成爲頑固的成見了。而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蒙蔽了，被人「遺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要求和流行口號。在這個口號中，除了對於民主制概念的市儈浮誇的描寫而外，是別無半點政治內容的。既然人們當時是爲了合法而用這個口號來暗示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會同意從鼓動觀點上來「暫時」「辯護」這個口號。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性的，因爲它不僅表現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粉飾，而且表現不瞭解社會主義觀對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擁護民主共和制度，作爲在資本主義下對於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可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然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任何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特別的鎮壓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

第五，在恩格斯這本含有大家都記得他關於國家消亡議論的著作中，還有關於強力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對這種革命作用底歷史估計也就變成了對強力革命的真正頌揚。這是「誰都不記得」的，關於

這個思想底意義在各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而在羣衆中的日常宣傳鼓動中，這些思想簡直不起任何作用。其實這些思想是同國家「消亡」論密切聯系而成爲一個嚴密的整體。

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論吧：

：「至於強力在歷史上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除作惡而外），「即革命的作用；至於照馬克思底話，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新社會的時候，強力就是這個舊社會底接生婆；至於強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道路和破壞殭死硬化了的政治形式的手段，——關於所有這一切，杜林先生都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了推翻剝削制的經濟，強力也許是必要的——這是他覺得很可惋惜的咧！——因爲據他說，任何應用強力的行爲都會使應用強力的人敗壞德性呵！雖然在每次勝利的革命以後都有過高度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進展，但他終究說出這種話來了！加之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須知民衆可能被迫進行強力衝突，這至少會有如下的益處：可以拔除那因三十年戰爭（五）的恥辱而浸人民族意識中的一種奴僕精神。而這種黯淡的、萎靡的、軟弱無力的僧侶思維，竟敢自薦給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麼？」（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第二編第四章末段）

怎樣才可以把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即直至他逝世時爲止，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來與國家「消亡」論結合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義，用無原則的或詭辯的方法任意（或爲了討好於當權者起見）抽出其中這個或那個議論來把它們結合起來，而且在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都正是把國家「消亡」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現今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論馬克思主義的正式作品中最適常和最普遍的現象。這樣一種替代，自然是不新奇的，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常見的事。當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爲機會主義時，把折衷主義偽造爲辯證法是最易於欺騙羣衆的，能够給一種似是而非

的滿足，似乎它顯到了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一切矛盾影響等等，而其實則不給予任何對於社會發展過程的完整的革命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強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這是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還要更詳細說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之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所替代，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而按通例是只能經過強力革命來實現。恩格斯對於強力革命的頌揚，完全同馬克思屢次的聲明相符合（我們要記得，在『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底結尾一段中，曾傲然公開聲言強力革命之必不可免；我們要記得，約在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六）批判』一書中會毫不留情地攻擊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性）——這種頌揚，絕不是『執迷』，絕不是豪語，也不是論戰伎倆。必須有系統地教育羣衆來這樣估計，而且只是這樣估計強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底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對於馬恩學說的背叛，其特徵就在於所有這兩個思潮都把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遺忘了。

由無產階級國家來替代資產階級國家，除非有強力革命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消滅，即國家底徹底消滅，則只能經過『自行消亡』而實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別革命形勢時，分析每一個別革命底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而我們現在就正要說到他們學說中這個顯然是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已經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底最初著作——「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作成的。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在這兩部著作中，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一般基礎而外，還有在相當程度內對於當時具體革命形勢的反映，因此我們來考察考察這兩位作者在尚未做出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結論之前他們關於國家的言論，也許是較為適當一些。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寫道，——將創造一個攔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階級對抗底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拿這個關於國家階級消滅而消逝的思想之一般概述，來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敘述對照一下，確是很有意思。

：「當我們敘述無產階級發展中那些最一般的階段時，我們也就循序考察了現存社會裏多少是隱藏着的國內戰爭，一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那時無產階級就用強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無產階級變成（直譯：提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

主。』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集中一切生產工具於國家手中，即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儘量迅速地增殖生產力總量。』（一九〇六年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第三七頁）

這裏我們看見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最精彩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無產階級專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說的那樣）的思想，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這個關於國家的定義，在各正式社會民主黨普遍流行的宣傳鼓動作品中，不僅從來沒有加以解釋過，而且恰巧是被遺忘了，因爲它是與改良主義絕不相容，它是當面打擊那些說什麼「民主制底和平發展」的通常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儉幻想的。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複着，硬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却「忘記」補充說，按照馬克思底意見，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是「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別的權力組織，是爲了用以鎮壓某一階級的強力底組織。究竟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哪一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爲着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能領導這箇鎮壓的，能實現這箇鎮壓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反資產階級鬥爭，將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之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維持剝削制，即是爲着極少數人底私利而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之所以需要政治統治，是爲着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即是爲着絕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反對極少數

的现代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以階級妥協的夢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的見解也是夢想的，他們不是把這個改革想像爲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而是想像爲由少數數和平服從那已經瞭解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是和承認國家超階級性的觀點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而在實踐上就走到叛賣勞動階級利益，舉例說，這是由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七一年革命底歷史所表明，這是由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在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所表明的。

馬克思會畢生奮鬥來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現時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復活了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把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貫引伸爲論政權、論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這一特別階級才能做到，因爲它所生存的經濟條件訓練它去進行這種推翻，給它以實現這種推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者階層，同時却團結着、統一着、組織着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够成爲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底領袖，這些羣衆受着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往往比無產階級所受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却不能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鬥爭。

馬克思所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要歸結於承認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藉羣衆武裝力量的政權。爲要實現推倒資產階級，就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爲統治階級，變爲能够鎮壓資產階級所必然進行的拚命反抗，並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來建設新經濟制度的這樣的統治階級，才能够做到。

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權，集中的權力組織，強力組織，既用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廣大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却把工人黨教育成爲一些脫離羣衆而代表那班工資較優的工人們利益的代表，只圖在資本主義下「營謀」苟安生活，爲着一飯之惠竟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即放棄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系。這個作用底完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特別的強力組織，那末由此就會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不預先消滅，不預先破壞資產階級給自己設立的國家機器，則創造這樣的無產階級組織是否可能呢？「共產黨宣言」曾接近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時，就說出了這個結論。

二 革命底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他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把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經歷着苦難的考驗。它在有條有理地執行着自己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舉行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底頭一半，現時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另一半。它首先使國會權力臻於完備，以便得到推翻這個權力的可能。現在，當它已達到這地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之表現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

成爲與它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着重點是我們加的）『而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這後半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有極複雜的人爲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隊伍加上五十萬大軍，——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氣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而且這個寄生機體是加速了這種崩潰過程。』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又擴大了政府權力底容量，機關和行政人員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除了更大的分工外，沒有增添絲毫新的東西』：

：『最後，國會制的共和國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竟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底工具和集中。迄今所有一切政變都祇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不是把它毀壞。』（着重點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底奪得，視爲自己勝利時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漢傑出版的德文第四版，第九八至九九頁）馬克思主義在這一精彩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了莫大的進步。在那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爲抽象，還是表現於最普泛的概念和語句中。在這裏，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而且做出了格外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說：過去一切革命祇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毀壞的。

這個結論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點。而正是這個基本點，不僅被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所完全遺忘，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曲解了（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一般的歷史總結，使人們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

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得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勝利以後就會立即開始消亡，因爲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既不需要，並且是不會有的。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怎樣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提出來且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既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就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偉大年代底歷史經驗來做基礎。馬克思底學說就在這裏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哲學的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呢？在每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在各被壓迫階級獨立行動面前，國家機器如何變遷，如何演進呢？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的任務怎樣呢？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君主獨裁政體崩壞時代。最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關，即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種機關恰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工人底經驗都把這種聯系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階級由於切身所受的苦痛領略到這種聯系的意味，——正因爲如此，所以工人階級這樣容易懂得並且這樣牢固地領會到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教訓，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不是昏聩地和輕浮地否認這個教訓，便是更輕浮地「一般地」承認它，却不願做出相當的實際結論來。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那些腐蝕着這個社會的内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然而正是「寄生」生命氣孔的寄生蟲。現時在正式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爲那視國家爲寄生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專有的屬性。這樣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把社會主義玷辱到這種地步竟將「保護祖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藉此擁護並粉飾這個戰爭的市儈們，當

然是很有益處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經過歐洲從封建制度崩潰時起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須得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其支配，大半就是經過這個機關來實現的，因為這個機關給予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底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靜和尊榮的位置，使這些位置底佔有著駕於人民之上。試看一看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後半年中所發生的情形吧：以前首先委任黑幫分子充當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贓物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却力圖把這些改良遷延『到立憲會議的時候』，而對立憲會議的召集則又慢慢遷延到戰爭結束時再說！但是對於瓜分贓物，佔據各部總長、次長、督撫等等肥缺，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配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在一切中央與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並重分『贓物』勾當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總結，客觀的總結，毫無疑義的是：各種改良辦法是延期了，官吏位置是分配過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的重新分配來改正了。

但在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間（如以俄國爲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間）『重分』官吏機關的事實愈多，則各被壓迫階級，首先是領導它們的無產階級，就會愈加認清自己與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黨——甚至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黨也包括在內——就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關，即仍是鞏固那個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抱定任務不是改良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把它破壞，把它消滅。

這樣提出任務，並不是由於邏輯的推論，而是由於實在的事變發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穎經驗。馬克思該如何嚴格地依據歷史實際經驗，這點我們可從以下事實中看出來：他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

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那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時，經驗還沒有給予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去。在一八五二年，根據如自然歷史觀察這樣的確切性所能指出的，還只有下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已接近到要「集中自己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毀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裏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為公理，把它們移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爲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序言裏說，——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階級搏戰，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國達到更加澈底的結局。這種階級搏戰所在以進展及其結果所藉以表現出來的那種變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鮮明。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它是一個純粹等級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它所具有的典型式的明顯性，實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而抬起頭來的無產階級反對那佔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裏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國所未見過的。」（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起，法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發生了停頓，但這個停頓，無論如何長久，絲毫也不是說，在行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不可能表現爲階級鬥爭達到決然結局的模範。

我們且把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底歷史拿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吧。我們可以看見比這要遲緩些，複雜些，舞台更廣闊得多，但總還是同樣的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或在君主制的國家（如英國、在相當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等等），都

形成着「國會權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賊物」的各資產階級黨和小資產階級黨，爲搶奪政權而鬥爭，而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始終不變，——最後，「行政權力」，其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又臻於完備和鞏固。

毫無疑義，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全部最新進化中的共同特徵。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這三年內，法國用迅速的、尖銳的、綜合的形式來表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巨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裏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裏，由於對無產階級的高壓之加厲，「國家機器」都異常加強起來，官吏軍事機關空前增長起來。

現在，全世界歷史，無疑是在較一八五二年更廣大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給了最可注意的材料。

三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的信摘要登載於「新時代」雜誌上〔七〕（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裏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這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底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各階級底經濟解剖。我所作出的新工作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過程所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momente der Produktion）相聯繫著

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根本消滅階級，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確的。而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瞭解和承認。無怪乎當歐洲底歷史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一切「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³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考茨基所著『無產階級專政』那小冊子，是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這本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按市儈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在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則卑鄙地背棄它的一個標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站在馬克思用上述言論所批評過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因為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內。（而在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

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

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公社社員這次嘗試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硬說企圖推翻政府就會是絕望的蠢舉。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人們強迫工人決戰，而工人已出身應戰時，當起義已成爲事實時，馬克思就不管當時有種種惡兆，而終以極愉悅的心情來歡迎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不以迂儒態度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如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而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却按自由主義精神大叫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公社社員們顯出如他所說的『衝天』的英勇精神而表示歡愉。雖然這次羣衆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在其中看見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個相當進步，是比較幾百個綱領和議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自己所抱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爲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就是由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是於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寫成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

：「特別是——他們繼續說，——巴黎公社已證明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提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放在單括號內的語句，是由兩位作者從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主要教訓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竟把它作為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恰巧就是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這個修改底意思是「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們，即使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的讀者們所不知道的。關於這個曲解，我們將在下面專論曲解的那一章內詳細說及。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那句名言之流行的庸俗「見解」，就在於認為似乎馬克思在這裏是着重指出緩慢發展底觀念以與奪取政權的觀點等等對立。

而其實却恰巧相反。馬克思底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以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為限。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即正值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寫信給庫格曼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見，我認為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着重點是馬克思所加：在原文上有 *zerbrechen* 一字），「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嘗試恰巧就是如此。」（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期，第七〇九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種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在「毀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這幾個字中，已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簡明表示出來了。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已被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遺忘，而且簡直被他曲解了！

至於馬克思從「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引出的語句，我們已在上面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議論中，有兩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以大陸來局限自己的結論。這在一八七一年時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閥機關，並且在頗大程度內還沒有官僚制度。因此馬克思就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於人民革命，曾想像不必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預備條件，且是確有可能的。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汚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碎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

第二，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

如果列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八），當然都得承認是資產階

級的革命。可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民衆，最大多數人民，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當中都沒有顯然積極地、獨立地起來爲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奮鬥。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在其中未曾有過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有時得到過的那般「燦爛的」成功，但它毫無疑義是一個「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民衆，大多數人民，呻吟於壓迫和剝削之下的社會最「下層」的人，都曾獨立奮起，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嘗試，即按自己方式來建設新社會以代替那正被破壞着的舊社會的嘗試，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某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爲自己開闢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由於許多內外原因而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在說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時，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是說得很多而且時常說過的），而極嚴格地估計到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在對比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國家機器，既是工人利益，也是農民利益所要求的，這個共同要求把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關於剷除「寄生蟲」而用某個新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呢？

二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呢？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還是十分抽象的，正確些說，還只指出任務，而沒有指示出其解決的方法。以『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關於這個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究竟會採取哪種具體形式，這個組織究竟會如何與最完備和最徹底『爭得民主』這點相吻合，——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既不願意陷於空想，就期待由羣衆運動的經驗作出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曾把公社底經驗——不管它是怎樣少——加以最仔細的分析。我們且把該書最重要的參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時，從中世紀發端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無孔不入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都發展起來了。隨着勞資間階級對抗底發展，『國家政權愈益帶有用以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機器底性質。在每次表明是階級鬥爭相當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底純粹壓迫性質，總是日益公開顯露出來』。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用以進行反勞動戰爭的全國武器』。第二帝國『九』把這種情形鞏固了。

『公社是與帝國絕對相反的』。『它是這樣一種共和國制底一定形式』，『其任務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底帝制形式，而且要消滅階級統治本身』：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形式，究竟是什麼呢？公社所會開始創立的國家究竟怎樣呢？

：「公社所頒佈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這個要求是現時一切想自稱爲社會主義的政黨底綱領中都寫着的。但是，它們的綱領究有什麼價值，這是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行爲中看得最明顯的，他們在事實上恰巧是在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以後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成。這些代表是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公認爲工人階級代表的人。」：

：「向來都是國家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革除其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爲公社底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的機關；其他一切行政部門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得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上等國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權以及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除而消除了……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立刻就着手來毀壞那精神壓迫底工具，即僱傭底勢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上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由公開選舉，而成爲負責並隨時可以撤換的。」：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那已被打碎之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備的民主制：取消常備軍，對一切公務人員施行完全選舉和撤換制。但在事實上，這個「僅僅」却是表明以一種在原則上不同的機關來代替另一種機關的偉大的更替。這裏恰巧看見「數變爲質」底實例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想像的那樣最完全最澈底的程度，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由國家（即用以壓迫某一階級的特別力量）變爲一種已非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於公社會特別必要，而公社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沒有充分堅決地來這樣作。但是這裏，實行鎮壓的機關，已是居民大多數，而不是少數，如像向來無論在奴隸制下，無論在農奴制下，亦無論在僱傭奴隸制下所有的情形那樣。而既然是由人民大多數自己去

鎮壓自己的那些壓迫者，那末專供鎮壓的「特別力量」已經不需要了！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就開始消亡。人民大多數能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底特殊機關（特權官吏、常備軍底長官），由自己來直接執行這些事情，而國家政權職能底執行本身愈是全民化，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性也就愈見減少。

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着重指出過的公社所採取的辦法：取消支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公務人員底薪水減低到等於「工人工資」的水準。在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如下的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變爲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鎮壓某一個階級的「特別力量」的國家，變爲由人民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中被人遺忘得最厲害的，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這一點！在通俗的解釋中——這樣的解釋不可勝數——是不說這一點的。對於這一點，正像對於已經過時的「幼稚行爲」一樣，「照例」是不講的，好像基督教徒得到國教地位時，便「遺忘了」原始基督教之帶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爲」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不過」是幼稚原始民主主義底要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始者」之一，即以以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會屢次演習鄙陋的資產階級嘲笑「原始」民主主義的伎倆。他如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也如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那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不在某種程度內「回返」到「原始」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不然，試問怎可進到使國家職能由大多數居民和全體居民來執行呢？）；第二，以資本主義成果和資本主義文化爲基礎的「原始民主主義」，是與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前期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創立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而在這個基礎上，舊「國家政權」底絕大多數職能，已如此簡單化，已可化爲這樣一種簡單到極點的登記、填表、檢查的手續，以至每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够執行這些職能，以至只要給以通常「工人工資」就足可執行這些職能，可以（而且應當）把這些職能中的任何特權性

的「長官制」影子都取消掉。

對一切公務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完全選舉和隨時可以撤換，將其薪水降低到通常「工人工資」的水準，——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辦法，足可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生底利益結合起來，同時就會成爲由資本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辦法是關係於社會底國家改造，即純粹政治的改造，但這些辦法當然祇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的步驟聯繫起來，即祇有與生產資料底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爲社會公有制的過渡聯繫起來，才能顯出其全部意思和意義。

「公社——馬克思寫道，——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關於「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爲它消滅了兩項最大的費用，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很少數人能「高昇」，能「出頭」——在資產階級意義上說，——即是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升爲生活有保證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凡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而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佔大多數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政府壓迫，是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政府。能够實現這一點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既實現這一點，同時就是向着按社會主義方式改造國家這方面前進一步。

三 國會制底消滅

「公社——馬克思寫道，——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這裏，普選權不是爲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人民的代表者和壓迫者（Ver- und Zerschlagen），而是應當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正好似個人選舉權服務於任何其他僱主來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會計員一樣。」

這個在一八七一年對國會制所作的精彩批評，現在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爲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對國會制的批評，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作，且根據這個十足加二的正當理由來把任何對國會制的批評都宣佈爲「無政府主義」！所以毫不奇怪的，就是在「先進的」國會制的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維德、列金、桑巴、倫諾德爾、亨德孫、王德威爾得、斯道寧格、布蘭亭、比沙拉底等等之流的「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而日益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不管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革命辯證法看作爲時髦的空談，漂亮的辭藻，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所慣作的那樣。馬克思善於無情摒棄無政府主義，因爲無政府主義不會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底「豬欄」，特別是在顯然沒有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國會制給以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什麼人應當在國會中鎮壓並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底真正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國會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那末，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底觀點來看，擺脫國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國會制呢？

又得再三反覆地說：馬克思從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請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遺忘得一絲不留，以至他們除了對於國會制的無政府主義批評或反動批評而外，簡直不懷得任何其他批評。

擺脫國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在於把代表機關由清談館變爲「工作的」機關。「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真是打中了現代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和國會「哈叭狗」們

底要害！請看任何一個國會制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後台辦理，是由閣部、官廳、參謀部執行的。在國會裏，僅僅專爲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真是真情實理，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它還未來得及建立真正的國會以前，國會制底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立刻發生作用了。腐敗市會中的英雄們，如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輩，切爾諾夫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竟有本領把蘇維埃也按最卑劣的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方式弄污了，將其變成爲清談館了。「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用種種清談和決議來愚弄那些輕信的農夫。在政府內面，實行不斷的更換角色，一方面爲的要依次安插儘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來「飽嘗」優厚尊榮的肥缺，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工作則在官廳和參謀部中「作」着！

當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人民事業」，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竇淫爲業的「好社會」中人底絕頂直爽口吻——自供說，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閣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仍然是舊的，它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的」對那些革命創舉實行怠工！而且即使沒有這個自供，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不也是證明了這點麼？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這些在內閣官場中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的切爾諾夫輩、路薩諾夫輩、孫齊諾夫輩以及「人民事業」報其他諸編輯先生們，竟喪盡廉恥，公然毫不害羞，毫不赧顏地當衆宣佈說，——儼如談開一樣，——在「他們的」閣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辭句是用來欺騙一般鄉下愚民的，而官僚辦公廳裏的就捱延宕則是爲博得資本家底「歡心」，——這就是「誠實的」聯合政府底實質。

在公社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那貪污腐敗的國會制的機關中，論斷和討論底自由不會墮落爲騙局，因爲議員們應當親自來工作，親自來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來檢查在實際生活中所得的結果，親自來直接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着，可是作爲一種特殊系統，作爲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地位的國會制，在這裏是沒有了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則我們就不能想像出什麼民主制，甚至連

無產階級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統治的志願，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願，而不是爲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辭句，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如謝德曼和列金輩，桑巴和王德威爾得一流人所幹的那樣，則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不要國會制。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克思講到既爲公社，又爲無產階級民主制所需要的那個官吏機體底職能時，他拿「其他任何僱主」所僱用的人員來與之比擬，即拿那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員」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與之比擬。

馬克思是連絲毫空想主義痕跡也沒有的，就是說，他並沒有虛構和幻想一個「新」社會。反之，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爲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拿無產階級羣衆運動底事實經驗作根據，而努力從這經驗中取得實踐的教訓。他向公社「學習」，正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底偉大運動經驗學習一樣，從來不向這些運動講過一句迂儒的「訓言」。（如像普列漢諾夫說：「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或如策烈鐵里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一舉而把官吏機體到處澈底消滅，這是談不上的。這是空想。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吏機體打碎，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機器，以便可以逐漸使任何官吏機體化爲烏有——這却不是空想，而是公社底經驗，而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當前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管理底職能簡單化了，給我們以拋棄「長官制」的可能，而把全部事情都歸結爲無產者（以統治階級資格）用全社會名義來僱用「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制度，不要任何從屬關係；這些由於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而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根本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祇會把社會主義革命延擱下去，一直延遲到人們變成另外一種人時爲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想由現在的人們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服從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國家官吏底特別「長官制」可以並且應當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就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已經是一般市民底知識水平所足可勝任，並且只給予「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執行。

我們工人自己從資本主義所已造成的成果爲基礎來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倚靠自己工人的經驗，創立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它，把國家官吏底作用歸結爲不過是執行我們委託的人員，歸結爲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平常薪水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所有各色各樣和各種程度的技術專家，——這就是我們的無產階級任務，這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可以而且應當從此開始的起點。這個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自然會使任何官吏機構逐漸「消亡」，使這沒有括弧的，不像僱傭奴隸制的新秩序逐漸創立起來，在這一秩序下，日益簡單化的監督和報告職能，將由大家來輪流執行，然後將成爲習慣，最後，便將不復成其爲特殊階級底特殊職能。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稱郵政爲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式樣組織起來的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一切托拉斯都變爲這種式樣的組織。這裏站在那些工作苦重而忍飢受餓的「簡單」勞動者頭上的，也同樣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僚。但是，社會管理底機體，在這裏已經預備好了。祇須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底鐵手去粉碎這些剝削者底反抗，毀壞現代國家底官僚機器，——那時，我們就有一個去掉了「寄生蟲」而擁有高度技術設備的機體，這個機體完全可以由已經團結起的工人們自己動用起來，僱用一些技師、監工和會計員，而付給他們全體以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亦如付給全體「國家」官吏一樣。這就是對待所有一切托拉斯之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既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估計到那已由公社實際開始了的（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全部國民經濟組織得如像郵政一樣，使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所有一切職員都領取不超過「工人

工資」的薪水，使其受武裝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消滅國會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各勞動階級免除資產階級對於這些機關的糟踏。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公社在它來不及詳細去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簡要大綱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應當成爲甚至一個最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是會由各公社選舉出來的。

：「那時還會留歸中央政府的爲數不多而意義重大的一些職能，則不應該廢除——硬說應當廢除，這是故意偽造，——而應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即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不應消滅，反而應當用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現實，其方法就是消滅那以這個統一底體現者自居，但同時却想離民族而獨立，且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其實，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身體上的寄生贅瘤而已。」……「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權底純粹壓迫機關，而其合理的職能，則要從這觀點着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底負責公僕。」

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之不瞭解——也許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瞭解——馬克思這些議論，該到了何種程度，這點在叛徒伯恩斯坦所著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上，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正是論到馬克思上述一段話時，伯恩斯坦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說來，在所有一切重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斯坦把「小資產者」幾字放在括弧內，想必他是用以表示諷諷的意思）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底思維進程是萬分接近的」。自然，——伯恩斯坦接着又說，——「市政局底意義在增長着，

但是「我覺得成問題的，是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未必就是如此消散（Auflösung——直譯是：解放，融解）現代國家，如此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其組織，如像馬克思和蒲魯東所設想的那樣：由各省或各省區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省區會議本身則又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織之，——這樣一來，全國代表機關底舊形式就會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一三四和第一三六頁）

把馬克思對於「消滅國家政權這寄生蟲」的觀點拿來和蒲魯東底聯邦混爲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爲機會主義者連想也想不到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根本不是要以聯邦制來和中制對立，而是要打碎現存於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只是他在自己周圍，在市儉庸人之流中和「改良主義」沉滯環境裏所看見的東西，即只是「市政局」！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則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關於這一點竟沒有人和伯恩施坦爭論過。許多人都會駁斥伯恩施坦，——特別是在俄國著作界中有普列漢諾夫，在西歐著作界中有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說到伯恩施坦這一對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之不會用革命頭腦思索問題，不會思考革命，真是到了極點，竟把「聯邦制」加到馬克思身上，把他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爲一談。而想做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却對此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支持之最庸俗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個庸俗見解，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在馬克思上述那段論公社經驗的議論裏，是連一點聯邦制的影子也沒有的。馬克思和蒲魯東的相同處，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所看不見的；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不同之處，却恰巧是伯恩施坦所認爲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和蒲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之處，是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的，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或巴枯寧不同之處，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待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者。在他上述那段議論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那些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能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認作是消滅集中制！

而如果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裏，完全白山地組織在各地公社內，將一切公社底行動統一起來打擊資本，打破資本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轉交全民族、全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麼？難道這不是最澈底的民主集中制麼？並且不就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麼？

伯恩斯坦連想都想不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由各公社自願結合而為一個民族，可能由各無產者公社自願溶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伯恩斯坦，也如任何一個庸人那樣，以為集中制只是一種自上的，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並維持着的東西。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的這些見解會有人曲解一樣，遂故意着重地說，如果非難公社要消滅民族統一並取消中央政權，那就是有意偽造。他故意使用「組織民族統一」一語，以便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拿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說的人，是比任何鴿子都要聖些。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就正是不願聽說要消滅國家政權，不願聽說要消滅這個寄生蟲咧。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引幾段。

：「新的歷史創舉底通常命運，——馬克思寫道，——就是人們把它當作是抄襲舊的，甚至是早已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因為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之相似。於是這毀壞（Zertrümmern——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公社底復活……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聯盟（孟德斯鳩、基朗特派（10））……看作是那反對過分集中制的舊鬥爭底放大形式。」

：「公社制度定會把那些寄生於社會而阻滯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吞噬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也就會把法國底復興與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定會使鄉村生產者，受每一省區內各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使他們能在那裏獲得城市工人作爲其自身利益底天然代表。而公社本身底存在又自然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已在成爲贅物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那是「寄生贅瘤」的「國家政權」，「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時成爲贅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公社經驗時用來評論國家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而現在却只得將其發掘出來，使廣大羣衆能够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根據他對所經歷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作出的結論，恰巧是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機已經到臨的時候，被人們遺忘了。

：「公社所引起的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現的利益之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極靈活的政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公社底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

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反對佔有者階級之鬥爭底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制度就會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空想主義者曾從事於『發現』各種使社會能在其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根本擺手不談任何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國會制的民主國家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極限；他們在這個『模範』面前祈禱到碰破頭額的地步，並且把任何想毀壞這些政治形式的意向都稱之爲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底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說，國家是一定會消逝的，而國家消逝底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沒有敢於去發現這個未來底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考察法國歷史，加以分析而作出按一八五一年事變所應作的結論：情形正歸結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而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革命運動業已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不管這個運動遭到挫折，不管這個運動爲期很短且顯然軟弱無力，而終於開始來研討，看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使勞動底經濟解放可能實現的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可以而且應當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

我們往下就會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中，在另一種條件下，繼續着公社底事業，並證實着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第四章 續上。恩格斯底補充解釋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之點。恩格斯會屢次說到這個問題，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個問題底其他方面發揮得非常鮮明而有力，因之我們對這些解釋必須加以特別說明。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公社底經驗，並再三說到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就是在論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顯然闡明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今國家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使我們有根據來把這兩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又顯然闡明那些不同的特徵，或者說達到國家消滅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這個問題是完全如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解決的：即是藉供求關係在經濟上逐漸的均衡來解決，但是這種解決法，本身又再三地產生出這個問題，就是說，不能給予任何的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要看時間和地方情形而定，同時也與那些更深遠得多的問題相聯繫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從事於製造將來社會結構底空想體系，那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時在各個大城市中已有很充足的住房，只要把這些住房應用得合理，便可以立即醫

助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東，而把那些沒有住房的工人或現時住在人數過多住宅裏的工人們搬進這些房屋裏去。而當無產階級一奪得政權時，這種爲社會福利所要求的辦法，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的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這裏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說到國家政權活動底內容。剝奪住宅和佔據住宅，也是按現代國家底命令實行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手續方面來說，也會「下令」佔據住宅和剝奪房屋。但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勾結着的官吏，對於實施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顯然，簡直是毫不中用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在實現後一種辦法時，單個工人變爲一個住房、一塊農民土地以及某些勞動工具底所有者；而在實現前一種辦法時，則由「勞動人民」成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發給個人或協作社。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的辦法並不就是要消滅地租，而是要把——雖然用變態的形式——地租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來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會排除承租和出租制底保存。」（第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內將考察這段引證中提到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滅底經濟基礎問題。恩格斯說得極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未必」——「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會毫無代價地發給住宅。把屬於全體人民的住宅取費租給各個家庭，就既要徵收這筆租金，也要實行相當的監督，又要有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有特別的軍閥官僚機關連同其負責人員獨享的特權地位。而過渡到可以免費發給住宅的情形，則是與國家完全「消滅」相關聯的。

恩格斯講到布朗基主義者（一一）在公社以後並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立場上來的時候，會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底必要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乃是進到廢除階級，同時也就廢除國家

的過渡。」：（第五頁）

那些愛好咬文嚼字批評的人們，或那些從事於「摧殘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也許以為，在這裏承認「廢除國家」，而在上述「反杜林」一段議論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公式來駁斥，是有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實備國際主義者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風氣，日益普遍地流行起來了。

國家隨階級之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一書中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議論，並不是簡單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似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廢除國家。

因為現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關於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曲解了，所以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在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彙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威權主義者」；這些論文僅在一九一三年才譯成德文發表於「新時代」雜誌上。

……：「如果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的立場時寫道，——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來替代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一種侮辱原則的莫大罪惡，因為他們為了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為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竟不放棄武器，不廢除國家，却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一冊，第四〇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哩！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那認為國家隨階級消逝而消逝，或國家隨階級廢除而廢除的意見，而是反對使工人拒絕運用武裝，拒絕採用有組織的強力，即拒絕那應服務於「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一目的之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那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的國家，以免人們把他與無政府主義鬥爭底真實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以廢除國家爲目的這一問題上，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意見。我們肯定地說，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運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爲要消滅階級，就必須有被壓迫階級底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選定最激烈最明顯的問題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工人推翻資本家底統治後，是應當「放棄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打破後者的反抗呢？而由這一階級來有系統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階級，若不是「暫時形式的」國家，那又是什麼呢？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問問自己：他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麼？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黨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的麼？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闡明得更詳盡，更遺傳得多。他首先就譏笑蒲魯東主義者那種糊塗觀念，因爲蒲魯東主義者自稱爲「反威權主義者」，即否認任何威權，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行中的海船來說吧，這些以應用機器和由許多人計劃合作爲基礎的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服從關係，因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某種威權或權力，則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動作起來，這難道不明顯麼？

……「如果，——恩格斯說，——我提出這種論據來反對那些最頑固的反威權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是呵！這是對的，但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代表的那種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爲只須改變某一事物底名稱，就可改變這一事物本身哩。」……

恩格斯這樣來指明了威權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底階段不同而變

更，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很荒唐的；並補充說，採用機噐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是在日益擴大着，然後恩格斯就由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推論進而說到關於國家的問題。

：『如果，——恩格斯寫道，——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社會組織祇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威權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成爲必要的事實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對名詞。』

『爲什麼反威權主義者不只以叫喊反對政治威權和反對國家爲限呢？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爲，國家以及政治威權，將由於未來社會革命底結果而消逝，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爲關注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威權主義者却要求一舉而把政治國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產生出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尙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底第一步動作就是廢除威權。』

『這些先生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必要，不得不藉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憑藉武裝人民底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麼？反過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爲公社把這個威權運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備麼？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威權主義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麼，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僅僅是散佈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這一點，而在這種場合，他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底事業。在前後兩種場合內，他們都只是効勞於反動派。』（第三九頁）

在這段議論中間，牽涉到那些在考察關於國家消亡時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將專門論述這點）時應當考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係指出國家消亡底過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在其消亡

底相當階段上，可以名之爲非政治的國家。

恩格斯這段議論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做恩格斯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三年以來，已與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幾百萬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當採取的爭論態度。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這就是恩格斯對問題的提法。無政府主義者所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權力、權威、政權、國家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歸結爲一句十足的市儈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厭棄。恩格斯底意見則完全不是這樣：他着重指出，所有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滅乃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然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即恰巧是機會主義派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所通常迴避不說，而專門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研究』的問題。並且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很果斷地說：公社不是應該更多多運用國家底，即握有武裝、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革命政權麼？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都是簡單用庸人底譏笑語句來敷衍，或至多也不過是用一句諛辭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樣的社會民主派，說它背叛了自己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是爲了極具體地來考察：無產階級對於銀行和國家，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態度。

三 給伯伯爾的信

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致伯伯爾信中下述的這一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

家問題的著作內，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議論之一。附帶說說，據我們所知道的，這封信第一次由伯爾刊印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生活』）第二卷中，這卷回憶錄是於一九一一年，即在這封信寫就並寄出之後經過三十六年才出版的。

恩格斯在這封致伯爾的信中，批評了那也由馬克思在致布拉克的有名信中批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特別說及國家問題時，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够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en）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利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相當的。』（見德文原本第三三二頁）

要注意到：這封信是關係於黨綱，而這個黨綱是馬克思在他距此信僅幾星期後發出的信裏批評過的（馬克思底信寫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那句話中使用『我們』二字時，他毫無疑義是以自己和馬克思底名義來向德國工人黨底領袖提議，從黨綱中把『國家』字樣勾銷而代之以『公團』字樣。

如果向現在這班爲選就職會主義者而偽造出的『馬克思主義』底頭目們提議如此修改黨綱，那末他們該會怎樣狂吠起來，大罵『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爲了這點會變壞他們的。

而我們則要做我們的事。在審查我們黨綱的時候，是絕對要注意到恩格斯與馬克思底忠告，以便更接近於真理，以便恢復馬克思主義而清除掉一切對於它的曲解，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困難也許只會在於名詞上。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團」，而恩格斯所採用的那個，並不是表示單個公團，而是表示各個公團底總和，公團底體系。在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字，所以我們也許只得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字，雖則這個字也有其不便之處。

「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這就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斷語。看了上文以後，這個斷語是完全可以懂得的。公社已不再成其爲國家了，因爲當時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居民底大多數，而是居民中的少數（剝削者）；它已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自己上台來代替那特別的鎮壓力量。凡此一切，都是離開了原來意義的國家。而如果公社臻於鞏固，那末在它中間，國家底痕跡就會自行「消亡掉」，它就會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將無事可做而逐漸停止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字樣來挖苦我們」，——恩格斯說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而言。恩格斯之所以認爲這種攻擊是正確的，乃是因爲「人民國家」是與「自由人民國家」一樣荒謬，一樣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曾努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其在原則上正確，使其除去那些對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偏見。可惜！恩格斯這封信竟被擱藏起來達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便會看見，就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複着那些爲恩格斯所警告過的錯誤。

伯伯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寫信回答恩格斯，就中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於黨綱草案的批判，並說他責備了李卜克內西底那種讓步態度（伯伯爾底回憶錄，德文版第二卷，第三〇四頁）。但是，

如果拿伯爾所著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來看，那我們就會在其中遇見一些對於國家問題的完全不正確的議論：

『必須把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為人民的國家。』（『我們的目的』，一八八六年德文版，第一四頁）

這是刊印在伯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接受了這如此頑固重複着的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議論，尤其是當恩格斯底革命解釋被藏匿着，而全部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四 『愛爾福特綱領』（二）草案批評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決不能不說到恩格斯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寄給考茨基，而直至十年以後才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出來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因為這主要是爲了批評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制度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而作的。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也給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表明恩格斯會如何細心深入地考察最新資本主義底種種變態，並因而如何善於在某種程度內預示到現今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如下：論到該綱領草案所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特質的『無計劃性』（Planlosigkeit）一語時，恩格斯寫道：

：『當股份公司進到統治並壟斷各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時，那就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的現象也停止了。』（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冊，第八頁）

這裏已經指出了對最新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估計中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變成爲壟斷的

資本主義。後面這幾個字是必須加上着重點的，因為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言，似乎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未曾產生，至今沒有產生，而且也不能產生的。就儘管托拉斯產生出某些計劃性，儘管資本大王們預先多少計算一國範圍或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多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其新階段上，但毫無疑義這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樣的資本主義之「接近」於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底真正代表看來，乃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容易實現，可以實現和不可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所有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但我們再回轉來講國家問題吧。恩格斯在這裏給了三個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與國家制度間的聯系；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說到共和國，那末恩格斯是把這點當作他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的重心。如果我們記起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它成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標本的事實，那就可以毫無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乃是批評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

「草案底政治要求——恩格斯寫道，——有一個很大的缺點。該草案中沒有說到那（着重點是恩格斯的）本來應當說到的東西。」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憲法不過是一八五〇年最反動憲法的抄本，德國國會，正像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君主專制底遮羞物」，想在這法定各小國存在和法定日耳曼各小國聯盟的憲法基礎上，實行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爲公產」，那就是「顯然荒謬的思想」。

「提到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爲他深知在德國是不能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在綱領中提出的。但是恩格斯並不因「大家」都以爲滿足，就簡簡單單容忍這個不言而喻的理由。

所以他又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當推進的。恰巧現時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刊物上散佈着的 (Circulante) 機會主義，表明這件事情是如何必要了。現在，人們害怕那反社會黨人法令 (一二三) 又會恢復起來，或是因回想起在這個法令盛行時所作過的某些過早的聲明，就想要黨承認德國現今的法定制度足以和平實現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害怕非常法令復活爲出發點的這個基本事實提在第一位，且毫不遲疑地稱之爲機會主義，並申言說，正因在德國缺乏共和制度與自由，所以關於『和平』道路的夢想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充分謹慎，而不自行掣肘。他承認，在具有共和制度或具有很廣泛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呵！) 有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一切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宣稱有這種可能，且在沒有任何必要時作出這種宣言，那就等於替君主專制揭去其遮羞物，而親自去替它遮蓋裸體罷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既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於是其中絕大多數正式領袖就果然成了君主專制底掩蓋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他們把一些普泛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在第一位，而藉此將那些在大事變一發生，在政治危機一爆發時，就會自然而然的提到日程上來的迫近的具體問題掩蔽起來。其結果就只會使黨在有決定意義的關頭突然陷於束手無策的狀態，而在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使黨不知所從和缺乏一致，因爲這些問題是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的：』

、『這樣爲着眼前片刻的利益而忘却宏偉的根本大計，這樣貪圖一時的成功，這樣專爲一時成功而不估計將來結果的鬥爭，這樣爲了現在而犧牲將來運動的態度，也許是導源於「誠實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都是機會主義，而且「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更要危

險些……

『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一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這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特有形式，這是法國大革命所已經表明過的。』……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重複說到一個昭然貫澈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認為民主共和國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必然會使這個鬥爭如此擴大、如此展開、如此暴露、如此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羣衆根本利益時，則這種可能就會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即在這個羣衆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的條件下，見諸實現。這在整個第二國際內，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了的話』，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上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遺忘情形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

論到與居民民族成份有關的聯邦共和國問題時，恩格斯寫道：

『什麼東西應當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它有反動的君主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國分立制，這個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底種種特點鞏固起來，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整體的德意志中。）『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使用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形式。聯邦共和國一般和整個說來，現今還是在美國廣大地區上所必需的；雖然在其東部一帶它已成爲障礙了。如果在英國建立聯邦共和國，那就會是一個進步，因爲在英國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個民族，而其國會雖然是統一的，可是此刻已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存在着。聯邦共和國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爲障礙物了。那裏，其所以還可容忍聯邦共和國制度，這僅僅是因爲瑞士自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純粹消極的一員而已。若在德國實施瑞士式的聯邦制度，那就會是一大退步。聯盟制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兩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盟的國家，都有其特別的民法和刑法，有其特別的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同時並存的由各國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自治邦不管其大小如何都以一個邦的資格來參加表決。』在德國，聯盟制國家是達

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過渡，我們的任務不是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二四〕往後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運動」來對它作以必要的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反而非常細心地努力去分析那些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個別情形底具體歷史特點來看清某一過渡形式是由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來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把聯邦共和國看作或者是例外情形和對於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進到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特殊條件下的「進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提出民族問題。

恩格斯也如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批評小國家底底反動性以及在一定具體情形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現象，可是他無論何處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偏向，——這個偏向是荷蘭和波蘭兩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的」小國家市儉狹隘民族主義之極正當的鬥爭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在這個無論從地理條件，或統一的語言，或數百年來的歷史看來都似乎已把英國各單個小疆小域底民族問題「解決了」的國家裏，恩格斯也估計到明顯的事實，認定民族問題還沒有消逝，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共和國底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為實現統一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進行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運用這個概念時那樣，把民主集中制瞭解為官僚主義的意思。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也不排斥廣闊的地方自治制，只要這種地方自治有各「公社」和省區自願堅持國家統一為條件時，便會把任何官僚主義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絕對消除的。

……「總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國」——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觀點時寫道，「但不是如像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現今的法蘭西共和國不過是一七九八年建立的沒有皇帝

的帝國而已。從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八年，法國每一省、每一公社（Commune）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正是我們也應當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才可不要官僚制，這是美國和第一法蘭西共和國已經向我們指明和證明了的，而現在澳洲、坎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又一次地指明給我們看。

這種省區的和公社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聯邦制自由得多的制度，在那裏，雖然單個自治邦對於整個聯邦國家是很獨立，但它對於縣和公社也是獨立的。自治邦的政府任命縣知事和地方長官，這是在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現象，我們將來在自己國家中也應當斷然排除，亦如排除普魯士的專員、縣長、省長以及一般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點，恩格斯提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規定如下：『在各省各縣各公社經過依普選制選出的官吏來實行完全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當局和各省當局。』

在被克倫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總長底政府所封禁的『真理』報（一五）上（第六十八期，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已經指出過，關於這一點——自然遠不只這一點——我國假革命假民主派底假社會主義的代表們，是如何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自然，這些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來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根據確鑿事實，按最確切的實例，駁斥那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以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些。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是比聯邦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真正要多些。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和省區等等所享受的最多的自由，是集中制共和國所給予的，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給予的。

對於這件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在我們黨的宣傳

和鼓勵中，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充分注意到。

五 一八九一年爲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爲『法蘭西內戰』一書第三版上作的序言中，——這篇序言是作於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最初登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對有關國家態度問題作了許多饒趣的附帶指示而外，又對公社底教訓作了一個極鮮明的總結。這個總結，由於有從公社起至當時止二十年間的全部經驗而更加深刻化，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那流行於德國的『國家迷信』的這個總結，真可稱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定論。

『法國每次革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說，——工人總是武裝了的』；『因此，在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看來，第一條金科玉律就是要解除工人底武裝。因此，在每一次由工人爭來的革命以後，就發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遭受失敗。』：

這個對於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瞭。問題底實質——就中也關於國家問題（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明得非常切要中肯。而恰巧這一實質，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大學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迴避不說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一個『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烈鐵里獲得了榮幸（卡芬雅克（一六）式的榮幸）機會來洩漏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秘密。策烈鐵里在其六月九日發表的『歷史的』演說中，偶然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裝的決定，同時當然把這個決定冒充爲他自己的決定，並且一般地是『國家』之所必要的！

策烈鐵里於六月九日發表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是每一個著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家都可引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來證明策烈鐵里先生所主持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革命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也與國家問題有關的附帶指示，是關於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其腐朽而愈益機會主義化，於是對於「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的有名公式，也就愈益加上庸俗的曲解。就是把這個公式曲解成爲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黨也是一件私人事情！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當時所奮起反對的，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還只看見自己黨內機會主義底最微小的萌芽，因此他在當時說得很謹慎：

『參加公社會議的，幾乎盡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它的決議就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有些決議是把作爲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基礎，而被共和派資產階級因其卑鄙怯懦所拒絕了的改良辦法，加以法定。例如實行了如下的原則：宗教對國家而言僅僅是私人事情。公社頒佈的另外一些決議，則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在某種程度內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

恩格斯故意把「對國家而言」幾字加上着重點，乃是針對着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加以打擊，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把宗教宣佈爲對黨而言的私人事情，——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底黨降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儈水準，這種市儈願意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絕對麻痺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這一任務。

將來著述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的人，當探究該黨在一九一四年陷於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論文中那些向機會主義大開門戶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於一九一三年「Das von Kirche-Bewegung」（與教會分離運動）的態度爲止。

但是現在我們且來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怎樣給奮鬥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的教訓吧。

以下就是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教訓：

：『正是至今存在的集中政府底壓迫權力——軍隊、政治警察、官僚，即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所創立，而從那時起被每屆新政府當作適宜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敵人的權力——正是這個權力，

應該在法國到處傾覆，亦如它已在巴黎傾覆過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本來應當承認，工人階級得到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從事管理；工人階級爲要不致又喪失剛才爭得的統治，它就應當：一方面剷除那至今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全部舊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就應當保證有可能防範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而宣告所有他們毫無例外地都可以隨時撤換。」……

恩格斯再三着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它的根本特徵，即把本來是「社會公僕」、社會機關的官吏，變爲社會主人的現象仍然保留着。

……「爲了不讓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這種現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都委任那些按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了按選舉者決議隨時可以撤銷被選舉者的法制。第二，它給予所有一切公務人員的薪水，不分職位高低，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所一般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這樣就造成了防止那種鑽營祿位和升官發財主義的可靠隄防，何況公社此外還施行了各代表機關代表須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

恩格斯在這裏講到了一個有趣味的界線，一達到這個界線，澈底的民主制就變爲社會主義，同時也就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爲，爲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服務機關底職能變爲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以便使絕大多數居民都能担負，都能勝任，然後且使全體居民都能担負，都能勝任。而爲要完全排除

* 這在名義上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計算，約等於六千盧布。有些布爾什維克犯了一種完全不可寬恕的罪過，例如他們竟在市議會中提議支付九千盧布的薪水，而不提議對全國施行以六千盧布爲最高限度的薪金，——這個數目是足夠的。

升官發財主義，就必須使那些雖然是收入不豐但亦「榮譽」的國家服務機關中的位置，不能成爲博得銀行或股份公司內肥美缺份的橋樑，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很常見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却又是多餘的事。這種似乎很機智而實則不正確的論調，對於任何一個民主設施——連對官吏支付普通薪水的辦法也在內——都可以如此重複，因爲貫徹到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會消亡掉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舊時有句笑話：如果一個人脫掉一根頭髮，那末他是否就成了禿頭呢？

把民主制發展到底，尋求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戰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爲社會革命而鬥爭中的基本任務之一。如果民主制是一種單獨存在的東西，那末任何民主制都不能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無論何時都不會是「單獨存在」的，而會是「總合存在」的，將也要影響到經濟，推進其改造，受到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是活生生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繼續說：

……「這種炸毀 (Sprängung) 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它的情形，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詳細描寫過了。但是，這裏還須再一次簡單論述這種代替底幾個特點，因爲恰巧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已經由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甚至很多工人底一般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說來，國家是「觀念底實現」，或譯成哲學語句，便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亦即永恆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而由此就產生了崇拜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事物的迷信心理，這種崇拜心理之所以很容易根深蒂固起來，是因爲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似乎全社會公共事業與公共利益只能用舊有方法來處置和保護，就是說，只有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作。人們以爲，假使不再去迷信世襲君主制度而主張民主共和制度，那他們就已是非常勇敢地前進了一步。其

實，國家無非是這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機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下。至少國家也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獲得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害；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也如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剷除這個禍害底惡劣方面，直到那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一代人能够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的時候爲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叫他們在君主制度山共和制度所代替時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對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讀起來好像是直接對於筵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一般先生們的教訓，他們在參加「聯合」政府的實踐中，正表現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對於國家的崇拜！

還要指出兩點：（一）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國家之爲「這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是「絲毫不弱於」在君主制度下的，但這根本不是說，壓迫底形式對於無產階級就漠不相關，好像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誨」的那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鬥爭形式和階級壓迫形式，能够大大促進無產階級爲消滅一般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二）爲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才能完全拋棄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呢？——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底消除問題相關聯的，我們現在正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底消除

恩格斯講到「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會連帶說及這一點。

恩格斯在他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一八七〇年代雜著彙集」(“Internationale aus dem Volkstaat”)的自序(作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中寫道：所有一切論文裏面，他都自「共產主義者」一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名詞，因爲當時法國蒲魯東派和德國拉薩爾派都自

稱爲社會民主主義者。

：「因此在當時，馬克思和我兩人——恩格斯繼續說，——都覺得爲了表明我們特有的觀點，絕對不可用這樣一個帶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許可以過得去（mag passieren），雖然它對我們這樣的黨，是仍舊不確切的（unpassend：不適當的），因爲我們黨底經濟綱領不簡單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簡直是共產主義的，因爲我們黨底最終政治目的是在消除全部國家，因而也就是消除民主制。但是，真正（著重點是恩格斯加的）政黨的名稱，是始終不會完全名符其實的：黨在發展着，而名稱依然如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臨終時都仍然忠實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曾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確切的黨的名稱，但是未曾有真正的，即羣衆的無產階級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有了真正的黨，但其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其名稱在科學上的不正確性不會對它隱瞞起來，不會妨礙它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個詭譎家會用恩格斯的說法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有真正的黨，它發展得很好；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沒有意義的怪異名稱，除表示我們在一九〇三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佔有多數（一七）的這一全屬偶然的事實而外，絕對沒有其他什麼意思的名稱，也是『可以過得去』的：也許現在，由於我們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黨人在七八月間肆行追究的結果（一八），已使「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成爲享有全民榮譽的名稱，除此而外，這種追究又還表明我黨在其真正的發展上作了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進步，因此，也許我自己也對於我在四月間提出的變更我黨名稱的提議猶豫起來。也許我要向自己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爲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幾個字留下放在括弧內面：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在通常談論國家問題時，人們常常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過而我們已經在上文中順便指出了的那個

錯誤。就是說：人們常常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消亡也就是民主制底消亡。

驟然看來，這樣的斷語似乎是極端奇怪而難於了解的；也許，甚至有些人會發生這樣的恐懼心：莫不是我們期望有一個將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麼？因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這種原則哩。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同一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制度，就是說，是爲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這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施行有系統的強力的組織。

我們所抱定的終極目的，是要消滅國家，就是說，要根本消滅任何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強力，任何加於人們的強力。我們並不期望有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但是，我們既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就深信社會主義將轉變爲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必要來對人們施用強力，不會有任何必要來使這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使這一部分居民服從於另一部分居民，因爲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起碼條件，而不需要有強力和服從。

爲要着重指出這個習慣的因素，所以恩格斯就說到新起的一代人，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生長出來的，能够把這全部國家制度的廢物完全拋棄掉』——這裏所謂國家制度是指任何國家制度而言，連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也在內。

爲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考察關於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問題。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刊登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上，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爲詳盡的說明。在這一精彩著作中批評拉薩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之聯繫的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伯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派」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驅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團」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爲甚至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底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幾乎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絲毫沒有企圖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正像例如一個自然科學家提出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進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却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國與它在美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乃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管其形式如何紛繁複雜，而各個不同的文明國度裏各個不同的國家却有一個彼此共同之點：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到「現代的國家制度」，以與其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

已經死亡時的那個未來相對立。

「其次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國家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遭到怎樣的變化？換句話說：那時，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類似的社會職能仍然會保存？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不然，無論你千百次地把「人民」與「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起來，也是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的。」……馬克思這樣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以後，就來說明問題的提法，且似乎是特別警告說，爲要給這個問題以科學的答覆，就祇可依據確切判明了的科學材料。」

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所完全確切判明了的第一點，亦即先曾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今又爲那些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遺忘的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時期或特別階段。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馬克思繼續說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便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底發展情形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那些實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民主制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究竟是怎樣變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它實際上始終只是供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致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條件，始終是被貧苦困乏壓榨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以致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的。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因爲在這個國家裏，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際此時期中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所作的，要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所作的多得多。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的這種政治上覺悟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

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大眾生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摒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脫離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脫離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亦即完全虛偽和騙人的民主制而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平穩朝着「愈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別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為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為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為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許多剝奪自由的手段。為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鎮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爾的信中很燦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着自由，而是為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即是把他們摒除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徹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是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世箴言上所重複說明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制力，不需要什麼強制，不需要什麼服從，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為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憤恨，引起抗議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供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那它也就會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有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別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這樣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

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大多數加於少數，被剝削者加於剝削者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乃是一件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悖的，於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的需要性就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極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羣衆底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預先在這裏指出一下）就够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爲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別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情，却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情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羣文明人都很容易和解除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的事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違背公共生活規則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生的根本社會原因，乃是羣衆被剝削，羣衆陷於飢寒貧困，而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漸進程度如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去憑空幻想，而是把現時所能確定的東西加以更詳細的確定，即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間的區別。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爲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打折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爲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後在消費品中又須取出一筆作爲管理經費，作爲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句（「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得不怎樣經營的問題作出很清醒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那已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底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人黨底綱領時）「所說的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出世而在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爲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歸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份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它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它也如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同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既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為私有。馬克思批駁拉薩爾所說一般「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模糊辭句時，就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起初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在內，連「我們的」杜干（一九）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譴責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避免的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結構及由此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式的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是不復存在的了。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這還沒有消除認許不相等人們按不等量的（事實上不等的）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

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爲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爲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來源都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說得如何正確。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爲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案，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就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礙着這種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種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施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

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將勞動變爲「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並且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速度爲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爲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爲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二〇〕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各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各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蘭、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譏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想到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二一〕一樣，是慣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並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公司，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公司來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

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從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以及附和他的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先生們說什麼狂妄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黨惑人心的約許，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約許，而且連想也沒有想來『施行』的，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錄過的他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按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所說那樣變成無政府擁護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為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裏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

瑣瑣地地釀造和「虛構」過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爲若沒有一個能够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哩！

驟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也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都是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生出來的社會實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个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爲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

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爲一種殞死、凝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羣衆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權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享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治理國家。而這點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民主制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體，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羣衆——過渡到全體人民概行參加的民衆——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這裏就是「激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即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的，就是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實現了的人人識字情形，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些已經社會化的巨大的複雜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專業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進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有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地們就曾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躍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

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庶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情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極，弄成爲一種非常簡易的，連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觀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條的手續*。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和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知識分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爲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爲一個管理處，成爲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爲要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底卑鄙醜惡現象，並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爲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變成廢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 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職能了」（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論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因爲當大家都已學會管理並且實際上已在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舉動就必然會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爲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的），於是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成爲習慣了。

到那時候，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

* 斯大林同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並發揮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以及在社會主義已經獲得勝利和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條件下這國家的任務。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聯共（布）中央工作報告內說道：

「……一九一七年八月，即是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成立幾個月以前，列寧寫成了他那部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列寧認爲他這部著作底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當時立意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分，在這一部分裏，他打算把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列寧在他這本書第二部分裏，是想依據我們國家裏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繼續闡明和發揮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沒有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但列寧所沒完成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該去完成的（羣衆如雷）。

國家是在社會分裂爲敵對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其所以產生，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和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是約束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是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保護本國領土以防他國侵犯。從前，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

形，會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了要推翻資本主義，不僅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必須剝奪資本家，而且必須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吏機關，打破它的警察，而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作了的。但是決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加以變更而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初原有職能在將來也應當完全保存。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境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的。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爲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那些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於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也就實現了兩個基本的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一點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底職能是要鎮壓那些不願從的人，但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爲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爲了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以防外來的侵犯。這一點也使我們的國家在外表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也進行過武裝保衛本國的事情，但這裏有一點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是爲了保護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而從前的國家反對外來的侵犯，却是爲了保護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

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新經濟底萌芽，並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分子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分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因此而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為捉拿懲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是歷史上從所未有，並且按其形式和職能來說，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停止在此地。我們是在繼續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印行，中譯本，第七八九至七九三頁）——編者。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

關於國家對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也如一般關於革命的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最有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增長而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標本的現象，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觸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來加以迴避，或者不理會它。

一般整個看來，我們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問題上採取了既有利於機會主義又培養機會主義的這種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把它完全庸俗化。

爲要簡括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且拿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著了一本專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關係問題的小冊子，標名爲「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是於一八九四年用德文出版的。

普列漢諾夫忽然異想天開的論述這個題目時，竟把反無政府主義鬥爭中最迫切最緊急和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事情，即關於革命對國家的關係和一般關於國家的問題完全避開不談！他的這本小冊子最出色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藝的部分，其中包含有許多關於斯底納（二二）和蒲魯東等人思想的寶貴材料；

另一部分是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着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

題目上的這種配合，不但令人可笑，而且足以特徵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的全部活動：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普列漢諾夫正這樣表明自己是個半學究、半庸人、在政治上是跟著資產階級底尾巴走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最詳盡地說明了自己關於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的見解。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出版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作最激烈的鬥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代表大會閉幕後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會企圖恰把巴黎公社宣稱爲『他們自己的』，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同時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這些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甚至沒有給一個略近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把整個關於國家的問題迴避不說，毫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公社以後的全部發展過程，這就必然要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因爲機會主義所最要求的，正是完全不提出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單是這點也就是機會主義底勝利了。

一一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在俄國文壇中的譯本，無疑是比在任何其他國家文壇中多得無可計量。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戲謔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的還要多些（附帶說說，在這句戲謔話裏含有比說出這話的人所料想的還更加深切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對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

主義文獻作品的需求，表現得非常厲害，空前未有，並且所得到的這些作品的譯本要比其他各國多得無比，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底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底所謂年輕基地上來了。

考茨基之特別著名於俄國，除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以外，就是他與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的論戰。然而有一件差不多沒有人知道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把考茨基怎樣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最大危機時期中滾到最可恥的錯亂境地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立場上去的情形加以考察，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不說的。這一事實就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勝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桿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曙光』雜誌（二三），曾不得不與考茨基爭辯，而把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決議（二四）叫作『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所持的態度是曖昧的、躲閃的、並且是調和的。在德國文獻中還刊行過考茨基底信札，這些信札也表明他在奮起攻擊伯恩施坦以前表示過同樣厲害的動搖。

然而，含有更大得無比的意義的事實，就是現在當我們研究考茨基最近叛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看到，在他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和問題解釋方式中，他恰恰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著作，即是他著的『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很值得注意的，伯恩施坦在其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斥馬克思主義爲『布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資產者千百次重複這種指斥來攻擊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特別說到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企圖——我們已經說過，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成就的——把馬克思對於公社教訓的觀點與蒲魯東的觀點混爲

一談。伯恩施坦會特別注意到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序言中特別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中把它至少重複過三次，將其極端曲解成爲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毀壞、炸毀（*Shattering*，即炸毀，是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而在伯恩施坦說來，似乎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分的革命手段。

這真是對馬克思思想之最粗蠻最醜陋不過的曲解了。

而考茨基在他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最詳細的辯駁中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肯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絕頂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他把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一書恩格斯序言中的一段話引來後，就說什麼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但它一般地是能够握取這個機器的，如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與馬克思真正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加在馬克思頭上，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問題的最重要的區別，被考茨基抹煞了！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問題，——考茨基在「反對」伯恩施坦時說道，——我們可以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見德文版第一七二頁）

這不是反對伯恩施坦的論戰，而其實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爲機會主義者此刻所需要的，恰巧祇是要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根本問題都「完全安然留給將來去解決」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在這四十年當中，教誨無產階級，說它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已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却玩弄手法，拿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替換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爭辯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道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這樣的話頭來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倆對於無產階級黨應準備工人階級去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存在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

我們且拿考茨基另一部更加成熟的，也多半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錯誤的著作來說吧。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裏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拿來作爲他所特選的題目。他提供了很多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迴避過去了。在這本小冊子內到處都只是說奪取國家政權，這就是說，他選擇的語法是向機會主義考讓步的，因爲它認許奪取政權而不必破壞國家機器。恰巧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認爲在「共產黨宣言」綱領上已經「陳舊」的東西，考茨基却在一九〇二年把它復活起來了。

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特闢一節，專論「社會革命底形式與武器」。其中講到羣衆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大國家底權力工具如官僚和軍隊」，但是關於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並非偶然的了。

考茨基把問題敘述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這個綱領底條款。至於一八七一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來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一問題方面所給出的新東西，他却不一置一辭。考茨基用下面這樣一些「堂皇」動聽的老生常談來敷衍了事：

「不言而喻，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革命本身就預定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定會改變我們現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如馬吃燕麥，窩爾加河流入裏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深刻的」鬥爭一類的話，來迴避下面這個對革命無產階級是很迫切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對於民主制的態度，比較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處」，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考茨基既迴避這個問題，在事實上就是在這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而在口頭上却向它宣佈赫赫可畏的戰爭，強調「革命思想」底意義（試問如果害怕向工人宣傳革命底具體教訓，那末這個「思想」究竟還有多大的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了」。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考茨基寫道，——可以同時存在着形式上極不相同的各種企業：官僚的（??）、工聯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如下的形式：由工人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而這個國會就規定工作規則並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可以交給工會辦理，另外一種企業則可以按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見一九〇三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頁和第一一五頁）

這個議論是錯誤的，它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公社教訓做例子所解釋的，是倒退了一步。從似乎必須有「官僚」組織方面來看，鐵路是和大機器工業內所有一切企業，是和任何工廠、大商店以及大資本主義農場絕對沒有什麼區別的。在所有這些企業中，生產技術都要求有絕對嚴格的紀律，要求每個工人萬分準確執行其所擔負的那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使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使機器損壞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來組成類似國會的東西」。

但是全部關鍵就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式的國會。全部關鍵就在

於這個「類似國會的東西」不會僅僅「規定規則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如像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範圍以外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東西」，當然會「規定規則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却不會是「官僚的」。工人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碎，把它根本毀壞，把它粉碎無餘，而代之以仍然是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的機關；爲了防範這些人變成官僚起見，將立即採取那些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的辦法：（一）不僅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水不得高於工人底工資；（三）立刻過渡到使一切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視底職能，使一切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就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爲「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思索過馬克思底話：「公社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考茨基完全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的區別，資產階級國會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用的）與官僚制（反人民的）聯成一氣，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則會立即採取辦法來根本剷除官僚制，且能夠把這種辦法實行到底，一直到把官僚制完全消滅，把供人民享用的民主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崇拜」國家，「迷信」官僚主義的態度。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的和最好的一本反機會主義的著作，即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因爲它是一九〇九年，在我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大進步，因爲其中不是說到一般革命綱領，像在一八九九年爲反對伯恩斯坦而作的小冊子那樣，不是不管社會革命到來時期如何而泛論社會革命底任務，像在一九〇二年著的『社會革命』小冊子那樣，而是講述那些使我們必得承認『革命時代』正在到來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指出一般階級矛盾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着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以後，在東方自一九〇五年起也開始着同樣的時期。世界戰爭以驚人的速度逼臨而來。『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期的革命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的時期了』。『革命的時代

正在開始」。

這些斷言是完全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爲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德國社會民主黨會客應要作什麼，而到戰爭爆發的時候，它（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墮落到了怎樣下流地步了。「現在的形勢——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道——會引起一種危險，使人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視作比現在更溫和的人」。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原來比人們所感覺到的還要更溫和得多，更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說過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爲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而所有這些迴避問題、甘守緘默、托辭推諉等行爲總結起來，就必然產生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事實，關於這個轉向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爲代表來聲明說：我保持着革命見解（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革命底新時代已經到來（一九〇九年）；但是，既然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我就畢竟要違背馬克思還在（一八五二年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一九一二年）了。

在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裏，問題正是這樣直截提出的。

三 考茨基與潘業枯克的論戰

潘業枯克以「左翼急進」派代表之一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這個派別有盧森堡、拉狄克及其他等人參加在內，極力堅持革命策略，而一致確信考茨基已轉到毫無原則地動搖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

「中派」立場上。這一見解底正確性已爲戰爭所充分證明，此時，「中派」（有人稱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派」，已把它全部可憎的卑鄙醜態性完全表露出來了。

潘萊枯克在他標題爲「羣衆行動與革命」，而論到國家問題的一文（『新時代』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三十卷，第二冊）裏，把考茨基底立場估計爲「消極的急進主義」立場，估計爲「毫無作爲的等待論」。

「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第六一六頁）。潘萊枯克這樣提出問題後，就談到我們所注意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任務題目。

「無產階級鬥爭——他寫道，——不簡單是爲爭奪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和消除（直譯爲消散，Auflösung）這些武器……只有把國家組織完全破壞，即鬥爭底最後結果已經到來時，鬥爭才告終止。人民多數底組織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底組織，而以此證明自己的優越性。」（第五四八頁）

潘萊枯克用以表示自己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他的意思畢竟是很明顯，且來看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這種意思，倒是很有趣味的。

「直到現在——考茨基寫道，——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要奪得國家政權，而後者却想要破壞這個政權。潘萊枯克則想要把兩者兼而有之。」（第七二四頁）

如果潘萊枯克底議論犯有不明晰和不充分具體的毛病（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因與本題無關，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是把潘萊枯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目找到了，而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却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爲自己的目的，認爲這個目的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只有當使國家走到消亡的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可以

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完全消滅國家，却不懂得實現這種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完全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所構成的公社式的國家制度代替之；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應當用什麼去代替它和無產階級將怎樣來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由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其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以利用現代國家為手段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反對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萊枯克，因為馬克思正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就是說，不能簡單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到新人手中來運用，而應當打碎、毀壞這個機關，代之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到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為他恰恰完全抹煞了為機會主義者所絕然不能接受的這個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把「奪取」解釋成爲簡單獲得多數，這就恰恰是替機會主義者留下一個逃身穴洞。

考茨基爲掩飾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起見，就採用書獃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自己底話。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說必須使「強力斷然集中於國家政權之手」。而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問道：潘萊枯克莫不是想破壞「集中制」麼？

這就不過是一套把戲了，正與伯恩斯坦在以聯邦制代替集中制的見解上，把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混爲一談的把戲相像。

考茨基所「引證」的話，與本題格格不入。集中制是無論用新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可能實現的。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會是集中制，可是這將是以「完全破壞」國家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爲基礎。考茨基採用十足的騙子手段，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那些

盡人皆知的議論迴避不說，却拖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句。

：『也許潘業枯克想要消滅官吏底國家職能麼？——考茨基接着說道，——但是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更不待說在國家行政機關內了。我們的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國家官吏，而是要求官吏以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的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勢，而是關於在我們尚未奪得國家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鬥爭是不是要消除（直譯為消滅）國家政權。內閣中有哪一部及其官吏可以消除呢？』於是他就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所取消……爲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得到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將來的國家」以怎樣的形勢，而是關於我們這個反對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第七二五頁）

這顯然是欺假手段。潘業枯克所提出的，恰恰是關於革命的問題。這是無論在他那篇論文底標題上或在上而摘引的那一段文字當中，都說得很明顯。考茨基既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就恰恰是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現在我們是以對黨，而在奪得政權以後，我們再來特別談論吧。革命就化爲烏有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求的。

這裏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而代之以由武裝工人構成的新機關。考茨基暴露出自己對於「關部」的「崇拜」，但試問爲什麼不可以由擁有十足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所設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關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將來會是「關部」仍然存在，還是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關；這些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還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是完全固守舊的），抑或要加以破壞而用新的去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由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由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用新的機器來實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

主義底基本思想，而考茨基却把它抹煞掉，或是完全沒有瞭解它。

他提出關於官吏的問題，顯然表明他沒有瞭解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底學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行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所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下，民主制是被僱傭奴隸制和羣衆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所縮小、壓抑和割削得殘缺不全。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職員就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出變爲官僚的趨勢，就是說變爲脫離羣衆而駕於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主義底實質所在，而當資本家沒有被剝奪以前，當資產階級沒有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公務人員都不免會相當「官僚化」的。

從考茨基的話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選舉的公務人員將仍然存在，那末在社會主義下，官吏也將仍然存在，官僚制也將仍然存在！這點恰恰不對。馬克思正是按公社底實例而指明在社會主義之下，公務人員將不復是「官僚」，將不復是「官吏」，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除實行選舉制以外，還實行隨時撤換制，並且還實行使薪俸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準，並且還以「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實質上，考茨基用以反對潘業枯克的全部論據，尤其是考茨基說我們就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內也非有官吏不行的那個妙極了的理由，就表明考茨基是重複着伯恩斯坦一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伯恩斯坦在他所著「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這本叛徒作品中，激烈反對「原始的」民主制觀念，反對他所稱爲「教條式的民主制」的東西：如絕對服從選民所給的委任書制度，不領報酬的公務人員，軟弱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維伯夫婦所解釋的英國工聯底經

驗。據說，工聯似乎是『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一三七頁）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按其七十年來發展的情形，工聯確信原始的民主制真已毫不中用，乃代之以通常的民主制，即與官僚制結合的國會制。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條件下發展，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發展的，在這個制度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禍害、強力、不公平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等的現象，非有種種讓步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下，『原始的』民主制底許多成份必然要復活起來，因為，人民大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第一次起來不儘實行獨立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一切都將輪流來管理，於是就會很快地習慣於不要任何人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頭腦，在公社底實際辦法中所看到了的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畏怯成性，因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決然脫離關係而害怕它且不願意承認它，無政府主義者則由於急躁，或由於一般不擅得大規模社會變動底條件而不願意看見它。『連想也不要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閣部和官吏哪能行得通呵』——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推論的，因為機會主義者滿懷着庸人思想，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性，而且還怕革命怕得要死（如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祇須關心到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着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底具體教訓，用不着分析應當用什麼和怎樣去代替那被破壞了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指無政府主義者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一流人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如此推論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得出的策略就是一種絕望底策略，而不是那種勇敢無情、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實際條件、用以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公社在數星期間就能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作出實行上述種種辦法來擴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義的榜樣。我們將效法公社社員底革命勇氣，我們將把他們的實際辦法當作是指示實際迫

切且立刻可能實現的辦法，那時，我們既按這樣的道路前進，就能達到完全破壞官僚主義。

實現這種破壞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時間，將推動羣衆去過新生活，將使大多數居民一無例外地都可執行「國家職能」，而這也就會一般地使任何國家都完全消亡下去。

：「羣衆罷工底任務——考茨基繼續說道，——無論何時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某問題上採取讓步態度，或用一個選統 (Entscheidungskomente) 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對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於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造成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相當變動 (Verschiebung)……於是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也如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國會中大多數爲手段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爲駕於政府之上的主人翁。」(第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這就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在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在行動上則背叛革命了。考茨基底思想僅限於要一個「選就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較之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這一原則，是倒退到庸人思想方面去。

考茨基祇須實現他所愛好的與謝德曼輩、普列漢諾夫輩以及王德威爾得輩的「統一」，因爲所有他們共同的鬥爭目標，也就是造成「選就無產階級的」政府。

我們則要實行和這些背叛社會主義的叛徒們分裂，而爲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務使武裝無產階級自己成爲政府。這真是「天大的區別」。

考茨基祇須同列金輩、達維德輩、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輩、策烈鐵里輩和切爾諾夫輩這些親熱伙伴們同處，因爲他們都完全贊成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對比底變動」，爭取「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這是極高尚的目的，其中一切都是機會主義者所可接受的，其中一切都是始終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範圍以外的。

我們則要實行和機會主義者分裂；而整個覺悟無產階級就會隨同我們一塊鬥爭，不是爲爭取『勢力對比底變動』，而是爲推翻資產階級，爲破壞資產階級國會制，爲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爲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而鬥爭。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有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如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達維德、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包括斯堪的那維亞人斯道寧格和布蘭亭在內），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噶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屠拉梯、特列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其實是一個始終依賴自由派的），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所有這些先生們，在國會黨團工作裏和在黨底政論方面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統治的作用，他們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毫無掩飾的機會主義。在這班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抑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毫無重大的區別。

我們根據這一情況，可以作出結論說：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們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公社底經驗不僅被他們遺忘，而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教導工人羣衆說，快到工人們應當發動起來的時候，那時務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代替它，並這樣來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爲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社會的基礎；——他們不僅沒有這樣作，反而教導工人羣衆以相反的東西，且用他們的『奪取政權』的方法，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處逃身穴洞。

當國家連同其因帝國主義比賽而加強了的軍事機關，已變成爲屠殺千百萬人民生命的軍事怪物，以求解決這一爭執，究竟是由德國或英國，由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時候，把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關係問題曲解和隱諱起來，是不能不起極大作用的*。

* 在手稿內還有如下一段：

第七章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

本章所標明的題目，如此廣闊無垠，是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的。在這本小冊子中，當然只好限於說明那些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政權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在此截止。——編者）

初版書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寫的。我當時已擬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大綱。但是除題目以外，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成，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妨礙」了。這種「妨礙」只可引為慶幸。但是，本書第二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也許要延擱一個長的時期；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

作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彼得格勒。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

簡要註釋

(一) 費邊派是英國資產階級知識集團於一八八四年成立的改良主義社會主義的「費邊社」社員。該社得名於古羅馬統帥費邊（「緩進家」），他素以緩進待機，迴避決戰聞名。費邊派誘導無產階級脫離階級鬥爭，鼓吹用微小改良辦法，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見正文第七頁）

(二) 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是英國社會學家。據他的學說，國家之產生，並不是由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出現的結果，而是由於「社會職能複雜化」的結果。——（見正文第一五頁）

(三) 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一九〇四）係俄國社會政治運動中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民粹主義思想家，即所謂「社會學主觀方法」底代表人物。列寧在他著的「什麼是「人民之友」？」、「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以及「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等書中，對米海洛夫斯基的觀點給了嚴厲的批判和打擊。——（見正文第一五頁）

(四) 聯合政府是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兩月後，即同年五月五日成立的第一屆臨時政府而言。參加這個政府的，除資產階級總長們外，還有孟什維克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和克倫斯基等。——（見正文第一七頁）

(五) 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係由德國封建諸侯反對帝王權力開始，隨後因有歐洲多數國家被牽入其中，就成了國際性的戰爭。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加強了封建諸侯的權力，使德國在政治上更加分崩離析，國內經濟陷於極端破壞與枯竭的狀態。——（見正文第二三頁）

(六) 「哥達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二四頁）

【七】『新時代』雜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出版於一八八三至一九二三年。——（見正文第三三頁）

【八】這裏是指一九〇八年二月葡萄牙的和一九〇八年八月土耳其的資產階級革命而言。——（見正文第三八頁）

【九】第二帝國，即拿破崙第三統治時期（一八五二——一八七〇）的帝國，以別於拿破崙第一統治時期（一八一四——一八一四）的第一帝國而言。——（見正文第四〇頁）

【一〇】基朗特派得名於「基朗特」一語，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大工商業資產階級政黨底代表者。——（見正文第五一頁）

【一一】布朗基主義者是法國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二）底信徒。

馬列主義底創作者認為布朗基是個傑出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底擁護者，但同時批評了他的宗派主義和陰謀活動手段。列寧曾寫道：「布朗基主義是一種否認階級鬥爭的理論。布朗基主義妄想不用無產階級鬥爭手段，而用一小羣知識分子的陰謀手段來使人類擺脫僱傭奴隸制度。」布朗基主義者在二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中起了顯著的作用。一九〇一年，布朗基主義者加入了畢得所創立的法國社會黨。——（見正文第五四頁）

【一二】『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城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見正文第六一頁）

【一三】反社會黨人法令，又名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是一八七八年在德國施行的。這個法令禁止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組織，取締了廣大工人團體，封閉了工人刊物，沒收了各種社會主義刊物，所有社會民主黨人都遭到壓制。該法令在廣大工人運動的反抗下，於一八九〇年被廢除了。——（見正文第六三頁）

【一四】這是指普魯士黨權派「自上」用武力把分裂的德意志各邦統一為一個國家而言。普魯戰爭（一八六六年）結果，成立了北德意志聯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便成立了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帝國。——（見正文第六五頁）

【一五】『真理』報是公開出版的布爾什維克日報，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刊，其組織者和領導人是列寧和斯大林。『真理』報當受沙皇政府取締，屢遭封閉，但接着又用其他新名稱繼續出版。第一次世

界大戰前夜，一九一四年七月，『真理』報被封閉，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沙皇制度之後，才以黨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正式機關報名義復刊了。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真理』報受到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方面的高壓，會處於半秘密狀態，並用各種不同名稱繼續出版。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它又用原先的名稱出版。

一九一八年三月，該報移到莫斯科刊行。從此時起，『真理』報就是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機關報名義出版了。——（見正文第六六頁）

〔一六〕卡芬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將軍，係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陸軍總長。他在同年六月間鎮壓了巴黎工人的起義。——（見正文第六七頁）

〔一七〕這是指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間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而言。代表大會原已在布魯塞爾開幕，但因警察追緝不得不遷往倫敦。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實際上這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代表大會，在這裏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代表大會上展開了黨內兩派（列寧領導的革命派和馬爾托夫領導的機會主義派）之間主要是關於組織問題的鬥爭，這一鬥爭使黨分裂成了兩個集團：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意思就是多數派和少數派，因為在投票選舉黨中央機關時，列寧底擁護者獲得了多數，而他的敵人獲得了少數。——（見正文第七二頁）

〔一八〕這是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彼得格勒發生的事件而言。這時，工人和兵士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口號下，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以克倫斯基爲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不願這是和平示威，却派出軍隊去反對示威者。臨時政府把示威鎮壓下去以後，就來追究布爾什維克黨，封閉了布爾什維克底中央機關刊物『真理』報，通令逮捕列寧，他不得不隱藏起來，捕捉了許多極有名的布爾什維克黨底活動家。但是黨由列寧和斯大林領導，艱於在這樣最艱難的環境中，準備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見正文第七二頁）

〔一九〕是指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干·巴爾諾夫斯基（一八六五——一九一九）而言。——（見正文第八二頁）

〔二〇〕施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一個標本的高利貸者。——（見正文第八五頁）

〔二一〕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一八三五——一八六三）所著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其中揭露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流行於俄國教會學校中的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氣。——（見正文第八五頁）

〔二二〕斯底納是德國反動哲學家、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史米特（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底假名。——（見正文第九三頁）

〔二三〕『曙光』雜誌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刊物，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等主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出版。——（見正文第九五頁）

〔二四〕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由考茨基提出而通過的決議案容許（雖然帶有附帶條件）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九五頁）



出版編號 0279

·讀必節粹·

命革與家國

·本及普·

發行者 出版者 著者

新華書店 解放社 寧

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1—20,000 (京)

庫 096



基本定價 3.00

